

太平天國時期

新會紅巾軍的起義

新會修志會編

1959年12月

前 言

这本小册子，是我们在修志过程中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，经过初步整编写成的。这个初稿，将来准备编入新志中。因此，这本小册子，也可视为新志的一部分。

但是我县自太平天国以后，地方文献散失，同治间的彭君谷所编“续志”和光绪间谭鑑所编“乡土志”，记载也极为简略；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至解放前的一段时期，文献既缺，片文只字，也几同“吉光片羽”。只有访之故老，徵之座谈；然而在这种贫乏的资料下，写出来的东西，自然不免“所见异闻，所闻异闻”的。

同时，由于我们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很低，写作技术也很拙劣，因而对资料分析和在文字组织上，难免有许多错误的地方。为了弥补这些缺憾，我们特先将它油印出来，送给你们，希望无论在政治内容上、或资料的校订上和文字表现上，都给我们提供意见！以便认真地加以修改补充。来函请寄：新会县修志会。

目 录

一、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新会社会-----（ 2 ）

（1）差役特务集团的残酷统治-----（ 2 ）

（2）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骄奢淫逸-----（ 4 ）

（3）地租的严重剥削和手工业纷纷破产-----（ 6 ）

二、红巾军的斗争情况-----（ 9 ）

（1）天地会的组织和红巾军起义-----（ 9 ）

（2）围城前夕-----（ 11 ）

（3）攻城纪实-----（ 15 ）

三、解围以后-----（ 21 ）

（1）都会、江门的浩劫和东北、西南两公局的成立-----（ 21 ）

-----（ 21 ）

（2）红巾军的继续斗争-----（ 23 ）

（3）解围后的苦难-----（ 28 ）

目 录

一、太平天国革命前的社会-----（ 2 ）

（1）差役特务集团的残酷统治-----（ 2 ）

（2）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骄奢淫逸-----（ 4 ）

（3）地租的严重剥削和手工业纷纷破产-----（ 6 ）

二、红巾军的斗争情况-----（ 9 ）

（1）天地会的组织和红巾军起义-----（ 9 ）

（2）围城前夕-----（ 11 ）

（3）攻城纪实-----（ 15 ）

三、解围以后-----（ 21 ）

（1）都会、江门的浩劫和东北、西南两公局的成立-----（ 21 ）

-----（ 21 ）

（2）红巾军的继续斗争-----（ 23 ）

（3）解围后的苦难-----（ 28 ）

太平天国时期新会红巾军的起义

公元1850年7月（道光30年），太平天国举行了武装起义，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，竖起了反对满清封建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鲜明旗帜。

在起义初期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河南天地会首领洪大全，进行了合作，南方各地的天地会党徒，也纷纷响应，不幸洪大全作战牺牲，使天地会和太平军在合作事业上，受到一定损失，但是各处的天地会党徒和太平军一样，始终都坚持反清斗争。

在1854年5月间（咸丰四年），广东以陈开、李文茂为首的天地会领袖，又在东莞、佛山、广宁等地举行武装起义；新会天地会领袖陈松年、吕瑞俊也起兵响应，巨太岳城。这次红巾的起义，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满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势力，而且吸住了清廷在广东的军力，使它无法北调，实际交接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。虽然后来在满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疯狂镇压下，先后遭到失败，但由此却加深了广大群众对满清王朝的仇恨，也使群众进一步认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貌。因此，如果说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斗争，是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真正开端，则那时天地会的红巾军，也是这个历史开端中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
一、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新会社会

（1）差役特务集团的残酷统治

新会地处广东西江下流，为开平、崖山、台山、恩平四县的交通咽喉，西下控制高、雷，东北接近广州，南临大海，浩渺无际，自宋末至明代以后，沙田渐积，民物繁庶，商业、文化都很发达。在清代初期，全县钱粮征额，年达白银30,000多两，大米8,350石，与南海、番禺、香山（中山）、顺德、东莞同称六大县。清乾隆在乡土志里说：“土地之广，人民之殷，早于全省，故绍铜符、奉院檄者，视新会为洞天福地”，所谓“洞天福地”，就是说做官的把新会看作贪污舞弊，发财致富的理想地方。

由于新会是当时全省六大县之一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阜，作为统治地^上的官府机构，也就特别庞大。除县治行政组织的官员外，单是直接与人民发生关系的皂隸、马快、民壮等差役，编制上就有106名。官府们就依靠这班如狼似虎的差役来进行残酷剥削和镇压人民的。

我们试从1828年5月间（道光8年），新会发生的那件“段差房”案件的材料来看，就可以了解满清封建王朝官府统治的魔爪是怎样的阴森可怕了。当时生员李如梅等因不满差房郑世瑜等所为，联名在按察使面前控诉和揭露了差房的罪恶活动一时。郑世瑜是差房的头目，儿子名遐泽，当时人们给郑世瑜的绰号为“通城虎”，称郑遐泽为“小霸王”，差役的取业，在郑家成了世业。郑世瑜父子不仅是自己个人作恶，而且树立党羽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差役特务集团。“凡输金而入其党者，名曰烧纸，便以公权相呼；愿效力而听其命者，名曰取牌，即以死生为誓”。这个集团人数，多至“役头百二，散役千余”，罹其害者，不知凡何年，凡何人”？①

他们还暗中设立了特务机构，在县衙对面，建造起几座“坐椅椅雨”，“门深几重，洞连故垒”的武庙、祖庙、关帝庙等。外表上借口供奉神灵和差役出入休息之所，实则内部却是暗无天日的大监狱。里面分为“八区”“三房”②。全县行政，无论什么命令都经过他们的手里去执行。因此，借势横行，贪赃枉法，就层出不穷。往往一案发生，这班差役就拿了县老爷的传票，双方有关人等，拘回差房监禁，被拘押在那里的人，便有所谓住“馆面”、“馆尾”之分，他们不是以罪名的轻重来分别，而是以贿赂多少来安置。住“馆面”的，两餐还可以准许送来，大小二便还准自由走动；但住“馆尾”的便臭气薰天，湿霉难堪。他们还唆使老囚对新拘押者加以摧残凌虐，劳令坐卧无地，片刻难安，不得不倾家荡产，四处求情，请住“馆面”而后已。如系他们的贪慾还未满足的时候，又故收案件拖延，至使候审无期，饱尝虐待。总之，他们是不同案情的是非曲直，“路之终，则不可放亦放，不路之钱，则不可押亦押”③，去当的权力，完全操在这班差役之手。为什么他们这般横行，而社会群众也绝不敢讲他们的半句坏话？因为他们可以驱使党羽，随时用种种手段，使你望尘蒙情，灾祸立至。这样，就做成一时“霸夫逞强，依附若辈以求全；巨贾逞强，私结其徒以济恶”④。

最後特务形成了一个“族大党强，财雄胆恶”的集团⑤，而这个集团给新会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。

毁葦房之案，虽然在新会闹了一阵，形式上虽然拆了几间神庙，但是毕竟只是官吏的助手，真正的罪魁还是当权者，拆几间神庙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反正葦房的积弊，一点没有改变。直到同治年间，新会人莫子青在他的诗里，仍然慨嘆地说：“官法杀人尚脱冠，官葦未，新编集”⑥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压迫的深重。

(2) 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罪恶滔天

太平天国起义以前，中国社会正进入空前的土地集中过程。接近人王瑛在“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”一文里说：“全国土地大约有十分之八是集中在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手里，而佔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，却只有十分之二的地”^①。在新会当时来说，佔有全县耕地面积十分之四以上的沙田区，它的私有土地，全部集中在少数的大地主手上和各大姓的公堂上，其余十分之六的民田，也分别掌握在大、中、小的地主手里，他们不仅在本县佔有大量土地，而且远及邻县，“红兵犯县”作者赵元洪说：“外海在大鳌沙等不下千顷”，新会及南顺等沙田多在香山”^②。外海乡大地主薛德之个人的田地，就有数万亩。由此可见，新会当时土地的集中情况是和全国各地一样，达到了高度的阶段。

其次，新会从18世纪中叶以后，买办资本和商业资本，到处都很活跃，但是在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害下，他们在新会始终没有起到促进生产的应有作用，相反的，几乎所有买办资本和商业资本，都和土地的剥削关系挂上不平之缘。他们和官府、地主、豪绅在农村中构成了剥削贫雇农、中农、以及手工业劳动者的有机联合，使社会矛盾趋于特别复杂和尖锐。象以洋商起家的潮连人董观恒的一家，从嘉庆年间起以买办姿态的示式出现，家财富强已达四、五百万两，他们除了享有横纵广东经济的洋行十三家之一的德广利之外，在武邑和中山，则田连阡陌，仅以所谓捐办义举的名义，捐田就有二千五百多亩。与此同时，商业资本家，如五福里的陈氏、何家大村的何氏、前城的黄氏、蓬江口的胡氏，他们都在这个时期的先后，因营商而时推一方，以至远近知名，但是无论那一家，最后还是把剥削得来的资金，转移到土地上来，因而更加迅速地助长了土地集中。

少故人的手里。

当时，那少故的官行、地主、买办和大商业资本家们，除了从广大人民身上剥削了大量财富外，还广置了园林第宅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在小小的新会县城里，到处有星罗棋布的亭台楼阁、歌台舞榭。象北门的北园、五福里的共园、南区的田心谷的东园等，到今天还可约略看见遗踪。其他如文蔚楼花园，秋南山的前松里，即瑶泰的秀林堂，虽早已毁灭，但在那里还是远远近近的，今天人们可在这些遗迹的脚下，看到一些零落的瓦砾，如手书黄庭坚的“题李愿盘谷图”诗说：“有竹万竿水中央，我欲从之还阮家。我欲从之还阮家，不须三代还阮家”，这首诗的序中并说：“荷亭池更，杏林花之一景也”。因此此一树一池的残照，也可窥见当年那些地主的昔日在天涯地角的荒淫生活。

地主的园林：不仅有了假山，在水池也凿筑不少，如西区的良和园各代三次地主的园林，有明代的，有清的，如洛、如益、如瑞兰之园，它们每家都筑有数十亩地一池，生石叠叠，各在在，不但筑筑以争奇斗胜，就以石筑山而筑，更有“松竹交翠”、“水远走马”的胜景，园的长堤可以走马，其面积之大，可以远见。至如外区的石渠园，它的面积，也是相当大的，至三大代筑园自元大世代至三凤书可办说。

可是，那一班广大的劳动人民，却无衣无食，无家可归，从新会的历史上看，自16世纪90年代起，就不断发生了饥荒，而且自此以后，饥荒的年代越来越多。1757年（乾隆22年）1768年，1769年，这年都闹成灾，每斗米价竟涨到10钱，在当时来说，就比平时米价也要贵，灾民以死，因此是如此的，1797年（嘉庆2年），1803年，1804年，1806年，1808年，1809年，1810年，1812年，1813年，都是饥饉的年代，在旧县志中就不断的记载着这些灾情，嘉庆元年，一共不过二十五年，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，人民是在饥荒中过活的，过去的文学家感慨的所谓“乾嘉盛世”，实际就是不过如此，到了道光年间，田亩的科派，日益增加，而堤围水利失修，荒芜，单是天河区内就有数千亩，因不能种植而二年抛荒的田。

封建统治者，只顾横征暴敛，地主阶级也只知道剥削农民，对生产完全不关心，到了广大人民忍无可忍，生活再不能活下去的时候，反托清封建王朝的斗争怒火，就象火山爆发一样燃烧

起来。

(3) 地租的严重剥削和手工业纷纷破产

在鸦片战争以前，（1842年）会城的河道，尚未淤塞，交通便利，商业繁盛，成为全县乡镇贸易的中心；也是四邑交通的主干航道，商业资本已逐渐发展起来，会城同有紫姓、竹栏、杉木栏、紫艇栏、望生栏、外埠、谷埠、木艇行、打铜铺、织网巷、打铜子、卖铁子、做笔子等行坊。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手工业的分工和商业的一些情况。

同时，农村中的经济作物，如烟叶、蕉蔗、甘蔗、茶叶、生菜等，也相当的发达，农产品的加工业，如茶厂、茶庄、茶市、凉蓑业、制材业等手工业作坊，也遍设于会城和各乡镇。天禄村云产的上白、次白沙粉，远销省外，被称之为天禄粉，可知它的产量是不少的。

至如与封建小农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手工业布业，素同村等乡云产的改罗布而，田边、潮连、牛头湾、沙坪、天亭云产的看砂布，均“为四方所尚，外夷宝之”^⑨，远销到汉口、广州、香港和海外各地。

但是，新会当时这种农业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，并不能说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。反之，在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下，得益者还是那些少数封建地主，买办和工商业资本家。试从当时的田租价值来探讨，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根据会城陶世烈堂的大亨记所载：他们于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以白银六十两，买受三二乡洋菜五斗田的田租二亩，租给农民每年所收谷租一十一石（约等于550斤），在过去每亩年产量，即使是上等田最高也不过三、四百斤，缴交地主的田租已去其六七，还要付田成本和不属于地租的各种杂捐，所余的就有限了。由此可以推想，普通农民一家数口，耕地十亩，终年辛勤，而食尚难支持，即使那时商业资本起着一定的刺激生产作用，经济作物较前有所发展，然而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重重束缚，反而促使农业加快破产。

不仅如此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，不但带了来鸦片烟，而且也大量的输入农产品及机制的棉纱和洋布。1833年，（道光13年）新会便开始见有大量洋米进口了^⑩。一向视为灾族的新会，连粮食也需洋米维持，其他的地方就可以想见。在洋布大量向中国推进的初期以来，虽然曾受到和农业有密切结合的手工业坊

织业的顽强反抗，但它以低廉的价格冲进市场，中国的手工纺织品不论棉布和麻布，也就不能不遭到严重的破坏。据统计1825——1826年间，广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只1895两，到1833——1834年间，就增加到451.565两。1829年，进口的英国棉纱为50万磅，棉布91万码，但到1840年，棉纱增加到2,419,560磅，棉布增加到21,355,763码^②。象这样直线增长，新会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波萝麻布和青纱布，不但国外市场为英国资本主义所掠夺，连国内的市场也丧失了。

本来手工业的工资，在那时已经低得可怜，新会所产的各种麻布，每足十丈，普通的天值良三、四两，但是织化的人工却不少，从纺麻纱以至织布，一人一月还不能织成一足，除去成本，织麻布的手工业每日最高的工资，不过收十个铜钱而已，当波萝麻布的洋布面前，它的销路便一落千丈，最后，不得不付机失业。正如当时诗人李泽霖的诗说：“却缘布布来西洋，遂使寒民有饥色”^③。

当时新会织布的手工业者出于濒死边缘的挣扎情景，在诗人李泽霖的“救正歌”诗中，也同样有所反映，诗云：“穷苦物助三叹息，贫家少妇当户织，十指纤纤冻且僵，日短天寒不足足。自言嫁夫已十年，嫁夫未尽恒艰难，四门索债如火煎，夫若回心囊无钱，贱妾无药为疗忧，努力织成价十千，何惜朝饥夜不眠，侧闻邻家贫未已，布机卖完又卖子，生计之难一至于此，……”从这首仅仅百字的诗中，我们得到证明：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，新会的织布手工业便如江河日下，到头来，不少的人走到了“布机卖完又卖子”的绝路上。根据旧志记载：“河村等乡，商贩贸易，每年不下十余万足”。以当时的生产能力估计，则当时受影响的机户，当在万户以上。

从以上点滴的历史资料来分析，可以看到满清封建王朝的政治是如何的腐败和黑暗，新会人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，生活已痛苦不堪，再加上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，使广大的农村生产，陷于崩溃，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濒于绝境了。他们对统治者的仇恨，逐年增加、生活迫使他们起来反抗，因此，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，正在进行北伐和西征的时候，广东天地会的红巾军，又跟着起义，新会人民也就同时起来响应了。

注①林星章：新会县志，“事略”，以下简称“林志”。

注②③④⑤全上

注⑥子青诗钞，莫芝云著，咸同间新会人。

注⑦见近代史料：1955年、3期。

注⑧林志：“样异”。

注⑨彭君谷：新会县志续，“杂录”，以下简称“续志”。

注⑩林志：“物产”。

注⑪林志：“样异”。

注⑫转引陈钰祺：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。

注⑬学海堂四集，25卷，李保瑞“织女叹”“凄风吹空月色苦，土灯蒙蒙弱复吐，机中老妇背灯泣，抱布出门售贱沽，洋钱一钱得五斤，先纺后织用力勤，绕机坐破十指裂，一月仅获十文勾，前时买棉索高价，梭鸣札札穿昼夜，贫户差足备饔飧，余力犹能半婚嫁，近来布棉俱贱值，终岁所获不偿息，却嫌市布来西洋，遂使寒门有颜色，唧唧复唧唧，机下鸣促织，织促竟何用，日织一丈或八尺，尺布所售能几何？一家嗷嗷八口食”。

二、紅巾军的斗争情况

(1) 天地会的組織和紅巾军起义

天地会或称三合会，或称三点会，相传明亡之后，明诸遗老，以复兴运动，一时未能实现，于是创立这种带有宗教性的社会，进行秘密结合，暗自寄托着排满复明的宗旨。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，它的会徒已遍布了南中国和台湾，以及南洋各地，进行不断的反清斗争。虽然每次都反动统治着残酷镇压下去，可是继之而起的，则势力越来越大；人数越来越多。1817年（嘉庆22年），广州三合会起义，失败牺牲的，就有二千余人^①。而转会于1802年（嘉庆7年）时，即见有所谓“会匪”出现，这时县令宋如槐，一闻“会匪”，在沙堆、古井等乡有些活动，便下令“各堡立乡勇，修闸栅，城内绅士、昼夜轮值、督率乡勇分巡街道，并搜各乡寓馆，查底始息”^②。从他们这样闻风丧胆，严加戒备，可知满清王朝，对天地会的害怕，达到什么程度。

那时天地会的组织，相当严密的。会规有雨摆三十六誓、二十一则、十禁、十利等。在三十六誓中，特别以“同生共死，结为一家，讨灭胡虏，恢复大明”为最重要；而诈骗、背盟、党友等项，都视为罪大恶极。此外又有票契和种种暗语：如称人为马，称粮为沙，称为黑狗，火药为枸橼之类，非会中人，无由了解。其首领称“大元帅”或“总理”，其次称“杏主”或“二哥”，第三称“白扇”或“先生”，第四称“先锋”，第五称“红桃”，这五级为会中的骨干；普通会员，则通称为“草鞋”。本来在中国历史上，农民革命往往和宗教有密切关系，而天地会形式属于宗教组的秘密结社。但是他们所信奉的，并不是一般道、佛教徒所崇拜的偶像，而是天地会的创造者和历代的领导人物。他们规定，凡入会后，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，入会先的称“老马”，虽少为兄；入会后的叫“少马”，虽长亦为弟。不分主仆、不分尊卑，一律以兄弟相称。会中费用，有钱者多派，贫者量力所及。拜会之时，任何人须受过一次严格的民族思想教育^③。绝对地遵守入会的誓言，实行反清的政治斗争和反对封建社会里的贫苦卑贱的阶级观点，否定封建伦理上的盲目服从。从这种会规誓言看来，与其说是宗教迷信的集会结社，毋宁说是民族革命运动的

一种组织形式。它能够在当时社会一般群众思想水平上，巧妙地利用宗教形式，推行平等思想，并对工农群众给予特殊形式的革命教育和革命组织，正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的革命要求。明白了天地会的性质，就可理解到为什么在有一清一代，天地会的人做所以会越来越多；势力所以会越来越大的原因。它正是和当时社会阶级化，满清的残酷压迫的关系是分不开的。

如上所述，天地会是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宗旨的。但是出于社会的发展，他们这一口号，到了道光以后，“复明”二字，已渐渐不适应于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。因为新兴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，促使国内的矛盾日趋尖锐，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思想，日益形成。他们在反对满清的同时，对资本主义的侵略者也“衔恨刺骨”④。广东天地会徒，在林则徐领导的鸦片战争，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，以及反对洋人入城斗争等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他们在每一次斗争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和取得胜利。但遗憾的是：满清的腐朽王朝，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面前，却采取了卖国屈辱的政策。因此，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过程中，也进一步使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。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和天地会的红巾军起义，正是企图彻底解决这个时代矛盾的伟大历史任务。

广东的天地会在起义以前，他们在广东的组织，大约分为四大堂口，珠江三角洲一带，则属于洪顺堂，以洪开、李文茂等为领袖。东北江一带，则属于洪义堂，以何六、卢昌等为领袖。西北江一带，以陈金刚、卢伟等为领袖，称洪兴堂。西江一带，以梁培友、区润等为领袖，称洪德堂。这些堂口的基本群众，是以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工人为主，其中也吸收了为数不少的失业和知识分子失业游民差役等，因而它的社会基础是极为广泛的。

正在太平天国举行革命的第二年，太平天国的东官丞相罗日纲调兵江西的时候，便派了卓木生前来广东和何六、陈金刚等人联系。同时上海的小刀会领袖刘丽川，也派他的弟弟刘杜川到伏山，约期起义。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，1854年5月13日，（咸丰四年）何六首先在东莞石龙圩，率领了皮鞋、油粉、棉毡各行业工人⑤，举起反清的义旗，接着广东各地的红巾军起义便爆发了。何六率领的红巾军迅速地占领了东莞县城，分兵到宝安、坛城推进。跟着，6月2日，陈金刚又在清远起义，占领芦苞，直指三水，准备进攻广州。广州附近的天地会于这时也准备成师，

6月11日，陈开、李文茂便在伏山率领了琼花会馆的梨园子弟和手工业工人④，祭旗誓师，号召讨天胡虏。并由李文茂率众前往属北，会同甘先、周春等当地天地会，佔领了伏苓市。

同时环绕在广州外围各县会党，纷纷响应，林洗隆起兵广州之河南、关巨起兵于沿海各地；在龙门有高六、邹新兰的队伍，番禺有陈显良的队伍，顺德有陈吉的队伍，恩平、开平、崖山等天地会也相继起义，一时声势浩大，全面展开了围攻广州的军事行动。

广州红巾军的力量，是以陈开、李文茂的队伍最强大，各地的红巾军也推他们为领袖。陈开称大守王上将军，李文茂称付上将军，何六、陈金凤、梁培反等称大将军，其余或称元帅、都督、总统、先锋、军师、司马等名号。参加起义的人，一律蓄发易服，改换明装。军队以红巾包头，故曰红巾军，或称洪兵，或称红头兵。

(2) 围城前夕

新会的天地会，自从1802年，（嘉庆7年）开始见诸活动后，至1804年，（嘉庆9年）天地会党徒梁修平、廖宣武等，又在属下围坑的地方，展开规模较大的对地主武装的攻击。由于当时力量尚属薄弱，不久在地主武装联合围攻下，梁修平等二十八人遭受失败，并从容牺牲于崖山的沙坪村。到了道光中叶，天地会党徒又复在新会东北各乡进行活动，迫得地主豪绅们不得不武装涉艇护耕。这正说明新会天地会的势力，到那时已逐渐成长，而且有力对地主阶级进行打击了。

道光咸丰间，新会的天地会，便以陈松年、吕瑞俊为首。松年潮连巷头人，起义时年四十余，盼一目，精技击，设武馆于江门；瑞俊又名金鑑，江门范罗冈人，监生出身，年五十余，充江门六寨更目。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，有机会和当时社会各的阶层人物相联系。他们在江门群众中，有很高的威信，“素为侪辈所服”⑤。因此，天地会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

自从五月间，何六生东莞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，四处警报频传，江门方面的地主豪绅，还企图利用陈松年所领导的天地会为他们作保护，陈、吕等人以一时起义的条件还未成熟，也佯为答

应，于是天地会在江门无形中取得了公开地位。举办团练时，陈松年又充“练目”，江门的武装组织便完全掌握在天地会的手上。加上当时那些受鱼栏资本家控制压迫的渔民，也是天地会的基本队伍。他们停泊江门的渔船，经常不下百艘，而且船坚炮利。从此，天地会在江门的武装实力，就更加雄厚了。

6月13日，广东西路一支红巾军由冯坤率领佔据了崖山沙坪圩，17日顺德龙山、龙江、甘竹、马宁等地方，也跟着为当地的红巾军所掌握。新会东北一带的天地会徒，早就跃跃欲试，10日天河、横江一带的会党，首先佔领猪头山，断绝了新会法军与广州的水道交通，30日西方邻县恩平、开平、崖山、新宁的交通也被断绝了，使城内的法军完全孤立。7月初7日，杜阮乡会党黄威、黄安与冯坤的红巾军取得了联系后，便立刻在城中举起了红旗，跟着次日，陈松年和吕瑞俊也就在江门的山吹响了雄壮的反抗斗争的号角。从那时起，新会的全部红巾军便大规模地投入了反抗斗争。当时江门的副张翼堂，把为黄元魁、一呼风声，连忙屈服潜逃。到此红巾军不费一兵一卒，便于7月初五日全部佔领江门。他们以崖山为根据地，称为北营，陈松年称北一大元帅，吕瑞俊称北营大元帅。

在这时，早已组织起来的四乡会党，跟着便纷纷响应，外延陈拔槐称为南营大元帅，梅冈苏黑虎称西方大元帅，七堡李文敬羊城平靖三王命，梅冈苏应龙称平靖东君，北洋林洋、张村黄连称大泽左右营大元帅，其余如天湖、潮连、东甲、都会、泰园、大洞、水边、小泽、皋头、白沙、南垣、河村、梧村、沙冈、礼乐、沙堤、里村、棠下、丹灶、蕉园、七堡、三八水等乡的首领，或称元帅，或称都督，或称将军，都各有自己的称号^①。此外如石头、天等、罗坑等乡，不知姓名的，更不可胜数。同时附城的四周如五福里、泗冲、大整、沙湾、紫竹里、帝临堂、西整、德滋里、东关顶、花林亭等里坊^②，也都有会党领导，率领起义群众，举旗誓师。

与此同时，离城较远的崖门两岬，古井、棠路、三村等乡，也都先后响应。这时全县各乡村，除了少数如三江、凌冲、龙泉等村，还在地主豪绅把持下未树红旗外，几乎个个都会农村，处处都树起红旗，欢呼沸腾起来。他们组织的队伍，或数百、或数十，或附别乡揭竿而起，千百成群，连妇孺也参加了各种战斗的行列。

在风起云湧的起义队伍中，还有不少失志的举人、监生、明经、秀才等知识分子参加。如濠江的赵泰来，本来是学运盐出身的举人，很有文名的学者，会写诗词，而且懂得造机械。他是天地会的老会员，红巾军起义之后，充当了江门大营的军师，负责宣传工作。小泽的梁祖爰、梅冈的苏经学，也都是读书人，特别是苏经学的笔锋，很是犀利，他在当时写了不少使反动派看见都觉得发抖红巾军檄文和告示。

那时，新会的红巾军总败号称二十万。声势之大，连反动的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说：“邑之被周也，四乡拜会之‘匪’，蒸熾山谷渔户，悉为‘妖’氛”①，又说：“亦有举人秀才甘为贼腹心者”②。象这样成千成万群众参加的反清斗争，真是新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情。

在新会参加战斗的红巾军队伍，它的系统，大约可分为五部分。以本县起义群众组成的队伍，多属陈松年、吕瑞俊领导。从崖山沙坪而来的队伍，则多属于冯坤领导。从南海九江而来的队伍，则属于举人老介福领导（介福改为姓汪）。从伏山派来支援的队伍，则属吴祥、黄植领导。此外还有古镇丁的聂供队伍，和解围以后，从香山高兰、三灶等地而来，而以海上活动为主的杜旺、李快的队伍。冯坤称水陆大都督，老介福称太守主帅，吴祥称前营大都督镇南王，黄植（水背人）称宣南王。跟着红巾军设置前线大行营于都会蔡村祖祠，设南营于大口冲冯氏祠，造成了对会城邑围的钳形攻势。

自从广东红巾起义以后，省城震动，清政府惶恐万分，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了保护老巢，把新会营参将卫佐邦的部队七百兵并调到省城。主那时新会营参将是兼辖开平、新宁（台山）崖山三县防务的，全营兵额仅有一千五百名，尚下来的只有左右营的老弱残兵四五百名，而左营守备冯瑞林，人们替他起的绰号叫“泥猪”，右营守备吴元陞，人们也叫他为“木雁”，都是贪生怕死、腐化无能之徒。这时消息频传，风雨欲来，邻县崖山、顺德等地，红巾军到处起义，县城里不少官绅地主世家，都纷纷逃避，觅地躲藏。

新会县令陈应麟（山东潍县人），生平残酷贪污，常纵容家丁杀人越货，人民恨之入骨。他虽然自知县城的官兵都是老弱残兵，不堪一击，但为了保全个人的功名利禄，非作垂死的挣扎不可。他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地动员当地的豪绅地主们的势力，给予

更多的名利，利用他们抗拒红巾军。于是在6月1日，陈应聘纠集地主们成立了冈州公局。但由于红巾军的势力很大，有些绅士不敢到局办事，人心浮动，草木皆兵。只有何瑄、陈殿兰、何定章等十数名臭名昭著的劣绅，勉强跟随，但也垂头丧气，凄然相对，个个都担心着死期会时刻到来。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陈应聘只得一方面屡发腊书赴省呼吁求援，一方面张榜募勇，筹募经费，派出绅士沿街劝捐，可是人们却灵闭门不纳，劝捐的成效，收效甚微。眼见公局也将垮台，于是陈应聘和那局绅们便要了一个大骗局，由陈应聘带头装模作样地假充慷慨，认捐白银五千两。借此向那些犹疑的地主劣绅，施加压力，然后又向商店住户硬性摊派。这样才勉强搜刮一笔经费，张罗了一千多名的地痞流氓，作为防守的队伍。

纠集了一些喽啰以后，陈应聘更进一步把土豪劣绅们组织起来，以原任把总何定章办军火，举人何超光办理调发，候选巡盐张吉柏办粮饷，诸生陈殿兰办文告，武进士许德元及各武生主持巡寨。原有左右营兵也指定驻防委冲关口，把总关元彪驻防水围，外委张朝显驻防马山，右营守备关元陞驻防西山，而以举人何瑄总理公局事宜。不但这样，他们还布置了暗探特务，四处搜捕城中天地会党徒，乡贤祠的看门老役苏贺，就在这时候遭受了毒手。同时严令街坊住户清查户口，凡旅店、下住馆、庙观、寺庵、祠堂均不许留外人住宿，屋、相、医、卜无家不在城的，也被赶出城外。所有消息，严禁流传，城内居民一切活动，都受禁止，就是炮轰落在屋顶，也只许关门坐在家里，不得奔逃躲避，违者格杀勿论。他们又为了提防江门的渔船砲械，和存北于烂炮台的大砲，落在红巾军的手上，星夜下令鱼栏驱逐渔船出港，责令六街值事缴回大炮，并派外委到澳门购置枪械（洋枪），派绅士到各乡办理团练。他们为了炫耀会城的防守力量，又加紧屯积粮食，制造闹剧，并将附城一带两旁的民房和城外的浮桥尽行拆毁，以便守望。

由于官绅、地主、劣绅们的顽固到底，经过了一个多月时间的备战，会城的防务，确也比以前加强了。然而更主要的，是当时红巾军，在战术上轻视敌人，以为城内兵弁，一堪一击，敌人孤立无援，而红巾军人气势盛，县城旦夕可垂手而得。他们在进攻以前，竟预先告知攻城日期，使敌人得以早为戒备。而城里约作内应的部分会徒，又以事机不密，被敌先行发觉。因此，造